

# 苏共二十二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 ——《中苏条约》签订 12 周年纪念活动探微

郭 昊

摘要: 1961 年 10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 进一步恶化了已陷入僵局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一个非常直接的信号是, 1962 年 2 月两国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12 周年的纪念活动, 成为 1951 年以来最为冷清的一次。这表明, 苏共二十二大以后, 中苏双方都对该条约维系两国同盟关系的作用及其象征意义丧失了信心。本文以中国外交部新解密档案为主要依据, 试图从这一特定视角来审视当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

关键词: 中苏关系; 苏共二十二大;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 周年纪念

中图分类号: D6;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574 (2015) 01-0069-10

1950 年 2 月 14 日, 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标志着双方同盟关系的正式确立。从 1951 年起, 中苏两国政府每年都会举行庆祝条约签订的纪念活动, 作为双方友好关系的见证。但从 50 年代后半期开始, 随着中苏关系逐步恶化并走向全面破裂, 双方对于庆祝条约签订纪念活动的热情逐渐大减。在某种意义上, 该活动已成为直观反映中苏关系走向的“晴雨表”。本文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新解密档案, 试图对 1962 年中苏两国政府关于条约签订 12 周年的庆祝活动进行详细考察, 以管窥苏共二十二大对中苏关系的微妙影响。

### 一、苏共二十二大发出的“危险”信号

1961 年 7 月, 中共收到苏方递交的新的《苏共纲领草案》, 并将其主要思想概括为“三和两全”, 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全民国家、全民党, 认为

其目的在于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放弃革命<sup>①</sup>，不仅违背了1960年莫斯科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还试图将赫鲁晓夫自苏共二十大以来所执行的路线理论化。中共预感，在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双方将有一场激烈斗争，遂做好了被迫还击的准备。

10月15日，周恩来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在会上，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了强烈指责，声明苏联将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并把和平共处称作“一面旗帜”，以便“各国人民、一切希望真正和平和人类繁荣的人将在这面旗帜下面团结起来”。赫鲁晓夫还将苏共新纲领的任务规定为：把苏联“引入共产主义轨道”，“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建成共产主义”；当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后，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必要的那种条件就消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内任务就完成了，“为了建设共产主义已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了<sup>②</sup>。并引申出了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概念。据此，中共更加坚定了对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判断，并迅速做出反应。

10月18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代表团在致词中增加一段批评赫鲁晓夫的话，以表达对阿劳动党的同情。次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再次强调了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建议兄弟党之间“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解决彼此的分歧，而公开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这种将内部矛盾暴露于外的做法，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sup>③</sup>。20日，中共中央经过讨论，认为苏共如此公开谩骂阿党实属意料之外，其锋芒是指向中共的，中方有必要给予回击并做好新一轮理论斗争的准备。22日，中苏代表进行了长达九个多小时的会谈，苏共完全不接受中共在苏阿关系及苏共二十大等问题上的立场，周恩来遂于23日提前回国。24日，中共决定公布阿党中央10月20日发表的声明，公开支持阿党的立场。中共认为，苏共二十二大主要不是讨论如何建设共产主义，而是要反对一切违背赫鲁晓夫意愿的兄弟党和国家；美国一面继续鼓励赫鲁晓夫搞非斯大林化、民主化和自由化，一面继续利用他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又掀起一个新的反华浪潮<sup>④</sup>。

1962年1月2日，毛泽东批示将《参考资料》摘登的《美报评苏阿关系》一文印发中央领导同志参阅。这篇文章中提到“共产党中国的毛泽东既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上的言论，也不同意他的具体政策”；中国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每一个共产党国家都应该有权决定它们自己的外交和内政的政策，而不是盲目地

① 参见阎明复、朱瑞真《随周恩来出席苏共二十二大》，载《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1期。

② 参见《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载《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67—268、183—184、240页。

③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1961年10月19日），载《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42页。

④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50—51页。

接受苏联的命令”<sup>①</sup>。虽只是寥寥数语，但中苏矛盾的根子却已跃然纸上。

## 二、中苏双方关于条约签订 12 周年纪念活动的情况

中苏矛盾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激化，使得中苏分歧达到一个新高潮，双方都对恢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确定的两国同盟关系失去了信心。这种心态在数月之后双方庆祝条约签订 12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更明显地体现出来。

### （一）苏方的庆祝活动

苏联此次庆祝活动的计划出台很晚，直到 1962 年 2 月 6 日，即距离庆祝日仅有一周时，苏联对外友协才将庆祝计划电话通知中国驻苏使馆，大致内容如下：2 月 13 日将在“友谊之家”举行庆祝会，安德烈耶夫主持会议，有二至三个代表致辞，邀请中国使馆代办张德群讲话，然后是文艺晚会；苏方还计划在莫斯科大学、动力学院、110 中学等处各举办一次庆祝活动；在列宁格勒和塔什干举行的庆祝活动，届时报纸将发表文章和放映中国影片，庆祝会场将展出中苏友协赠送的图片。驻苏使馆得知这一计划后，迅即并将草拟的庆祝会讲话稿传回国内，要求抓紧审批<sup>②</sup>。

2 月 14 日，驻苏使馆向中国外交部和中联部汇报了苏方庆祝活动的整体情况。总起来看，这一次苏联无论是在庆祝方式上还是宣传规模上，较之过去任何一年都是最简单的，主要表现在：（1）莫斯科的各界庆祝会未按惯例在工会圆柱大厅举行（容纳一千人以上，可组织电视转播），而是改在了友谊之家（只能容纳二百余人，不能电视转播）。苏联领导人中只有主抓农业的沃洛诺夫一人出席，他和中国方面从未打过交道，估计是匆忙请来的，以与北京的庆祝大会相平衡。会议只进行了 45 分钟，除安德烈耶夫致开幕词外，只有工人、知识界代表各一人讲话，气氛一般。（2）过去每年都有电视讲话，距此次庆祝活动十天前，在庆祝苏罗同盟条约签订 14 周年纪念会上，罗马尼亚大使还作了电视讲话，而这次却根本没有邀请中国使馆做电视讲话。（3）基层庆祝活动大大减少，一共仅三起，其中只有一起邀请了使馆人员参加。而 1961 年有 33 起，邀请使馆人员参加的有 22 起之多。（4）报纸宣传规模较小。13 和 14 日，除《消息报》《真理报》各发表了一篇不署名的文章以及《红星报》《农业报》各发表署名短文外，其他各报只有零星报道。《真理报》对莫斯科各界庆祝会的报道比较醒目，并刊登了会场的大幅照片，但对中方庆祝会的报道却极其简单，只在第 4 版以“昨日在北京”为题目，用 100 字左右的篇幅报道了北京庆祝会，其他各报对莫斯科和北京的庆祝会几乎未

<sup>①</sup>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7 页。

<sup>②</sup>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二周年：请示报告、晚会情况、苏联驻华使馆晚会及双方讲话稿、与驻外使馆来往电、外省市庆祝办法及反映》（1962 年 1 月 4 日—1962 年 1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7-01003-01，第 59 页。

作任何报道<sup>①</sup>。

在苏联方面的讲话和报纸宣传中，对中苏友好团结的意义一般还都有所强调，但仅列举赫鲁晓夫有关中苏团结的言论，避免涉及双方争论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苏方着重强调“中苏友好条约”保障了中国的安全，使中国有可能在建国之初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阻止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苏联对中国进行了全面无私的援助，中国是依靠苏联帮助建立起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绝口不提中苏相互援助，只说中国向苏联提供了若干原料和产品；绝口不提毛泽东，只是笼统地谈到中国工人阶级、共产党及其公认的领导人，这也是与过去不同的。苏方还特别强调苏共二十二大的意义，声称苏联人民是在二十二大决议所激起的劳动热情高涨的情况下纪念中苏同盟12周年的。安德烈耶夫在庆祝会开幕词中还强调说：苏联向全世界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保证，苏联人民一定能够完成苏共纲领所提出的任务。此外，个别文章（如《消息报》的短文）在谈及中苏同盟和社会主义阵营保障了中国的安全、粉碎了美帝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以及促进中国的国际威信大为提高之后，还语义双关地指出：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一点<sup>②</sup>。

在苏联准备庆祝活动的同时，中国驻苏使馆也在时刻关注苏方的动态。1962年1月8日，中国使馆对拟采取的对策和举行的活动提出了初步方案，认为彼时的中苏关系正处于一个暂时性间歇和准备新斗争的阶段，因此应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利用这个节日积极主动地开展一些友好活动，做好对苏联人民和广大干部的友好团结工作，公开、合法地适当扩大中国的影响，以增进双方的友谊和团结。另一方面，鉴于这年是非逢五逢十的大庆，根据双方过去的协议，不搞正式招待会，活动规模亦不宜太大，大体上相当于1959年（九周年）的水平。庆祝活动的邀请对象，以平时与中国使馆有密切工作关系的苏联机关团体中下层干部和基层组织代表为主，采取分散进行的方式。中方人员应热情友好地参加活动，不主动挑起争论，但遇有原则性问题和不好言行的，需按中央的方针政策作适当斗争，准确把握斗争策略，区别对待。中国使馆方面准备组织以下几项活动：（1）暂定于2月14日举办一个规模在200人左右的友谊晚会，参加对象为苏联外交部、苏共中央联络部、苏中友协、对外文委、文化部、高教部及其他少数有关机关团体；拟邀请苏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和苏中友协主席安德烈耶夫等参加，不请外交使节；晚会主要内容是看电影、冷热餐，不准备讲话，谨致祝酒词。（2）各专业单位分别举办几个电影招待会：使馆办公室（以代办名义）暂定于1月30日邀请苏联事务机关系统100人左右参加；谭、郑、黄三参赞处和耿锐同志处，暂定于2月7日和9日分别

<sup>①</sup> Знаменательная Дата, 14 февраля 1962 года, Правда; Вчера в Пекине, 14 февраля 1962 года, Правда.

<sup>②</sup>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二周年：请示报告、晚会情况、苏联驻华使馆晚会及双方讲话稿、与驻外使馆来往电、外省市庆祝办法及反映》（1962年1月4日—1962年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7-01003-01，第49—51页。

联合举办两次电影招待会，邀请苏联经济、贸易、科技和军事订货部门代表参加，每次约 200 人；武官处邀请苏联军事系统 100 人左右参加，暂定在 2 月 19、21 日分别举行。(3) 采取积极态度参加苏方组织的活动，同时作好讲话的准备，以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在加强友好工作的同时，在思想上提高警惕，作必要的斗争准备。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亦应适当利用这个节日，加强同苏联教师和学生的团结友好关系，如所在当地有活动，应积极参加。(4) 使馆不准备向苏联有关方面祝贺，如对方来贺，则可回谢<sup>①</sup>。

2 月 14 日晚，中方在驻苏使馆举行了庆祝活动。这一次苏方的出席率较高，共到场 240 人，占邀请总人数的 40% 以上，葛罗米柯、安德烈耶夫、库兹涅佐夫、普希金、茹可夫等均到场出席。晚会总的气氛不错，苏联方面很多人都向中方表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一定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其间也发生了两起挑衅事件：一是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三秘罗古林，在攻击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时，说中方发表其言论是对苏联的不公正、不友好，指责中共不信任成熟的党如法共、意共，而相信一个犯错误的小党。罗古林还说，中国如不改变现行路线，则将无法和苏联现行路线合拍。二是葛罗米柯的夫人告诉中国使馆代办张德群的夫人，说美国报纸经常挑拨中苏关系。在谈及苏阿关系时，她认为中国支持阿是担心把阿划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苏阿关系不好的原因是阿领导人在国内实行家族统治，杀害异己。对于以上挑衅，中国有关方面均作了必要的驳斥。在晚会进行中，莫斯科电视台突然来电话，邀请张德群当晚十时去作广播讲话。当中方告之因事先未得到通知、现正进行晚会、应约有困难时，苏联方面称“因中国使馆未表示作电视讲话的愿望，久等未得到消息，故主动探问。”这显然是因为苏方事先并未准备组织电视讲话，现临时匆忙补救，并企图将责任推在中方身上<sup>②</sup>。15 日的《真理报》在对中使馆庆祝晚会进行报道时，只在第三版详细摘登了张德群的祝酒词和葛罗米柯的讲话（讲话中提到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同时摘发了《人民日报》社论的内容<sup>③</sup>，其他各报均只发了简讯。

## （二）中方的庆祝活动

1961 年 2 月 5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外交部对庆祝条约 12 周年活动提出以下意见：（1）由中苏友协会长宋庆龄致电苏联对外友协主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协主席安德烈耶夫，我国一些与苏联有直接联系的地方友协、基层单位以及与苏联接壤的边境城市，也可按惯例发贺电；（2）2 月 13 日在怀仁堂举行庆祝晚会，邀请苏联

---

<sup>①</sup>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二周年：请示报告、晚会情况、苏联驻华使馆晚会及双方讲话稿、与驻外使馆来往电、外省市庆祝办法及反映》（1962 年 1 月 4 日—1962 年 1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7-01003-01，第 60—61 页。

<sup>②</sup>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二周年：请示报告、晚会情况、苏联驻华使馆晚会及双方讲话稿、与驻外使馆来往电、外省市庆祝办法及反映》（1962 年 1 月 4 日—1962 年 1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7-01003-01，第 53—54 页。

<sup>③</sup> Великий праздник дружбы, 15 февраля 1962 года, Правда。

驻华使馆全体外交官员和其他在京苏联人员（如在中国空军部门工作的教员和留学生代表等）出席，并邀请苏联大使作简短讲话，建议陈毅副总理等出席；（3）苏联总领馆或商务代表处所驻城市，由当地友协举行庆祝晚会，双方代表可做简短讲话。伊宁、满洲里、集宁以及有苏联人员工作的单位（如空军）、有苏联学生的学校，可进行联欢，双方均不发表讲话；（4）《人民日报》于2月14日发表社论，其他主要报刊可转载，新华社等宣传机构可在节日前后适当报道两国庆祝活动，重点强调“中苏友好条约”的重要意义、中国的对外政策、两国建设成就以及中国对加强中苏团结的一贯立场和态度，可放映几部苏联电影和组织广播节目，但不搞电影周；（5）中国驻苏使馆可举行友好活动并积极参加苏方活动，但不倡议其他驻外使领馆和代办处与当地苏联机构举行活动，如果苏方主动邀请，可同意参加，苏联驻华使领馆等机构如提议联欢，也可同意。当天，中国外交部将这个办法同时通知了其他驻外使领馆和代办处。

中方这次庆祝活动的规模大体相当于1958和1959年，但有两项不及过去：一是举行庆祝活动的大城市由10个减为5个，二是取消了以往的报告会、图片展览等宣传文化活动。较之前多了一项，即给大约20个苏联基层单位发贺电，这些基层单位都是从1960年起通过两国友协合作计划与中国建立直接联系的<sup>①</sup>。当时，中方还未获知苏方的庆祝计划，但鉴于苏联使馆已进行试探，遂决定早做准备，防止被动，并打算暂不将活动安排告知苏方。可以推断，苏联对此次纪念活动计划做了充分的保密工作，也可能根本就没有提出计划，而中国方面的积极准备，也颇有一种“见机行事”的含义。

2月13日，上海市举行了900余人的各界庆祝大会，邀请苏领馆秘书以上人员、苏商务处和验船处处长等以及其他兄弟国家领事共50人参加，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出席大会，会后演出了文娱节目。14日，苏联驻上海总领事柯立朝在上海国际俱乐部举行小型酒会，邀请上海市领导人及外宾、外事处友协等单位负责人参加，曹荻秋等24人应邀出席，会后放映了苏联电影《理想的实现》。15日，苏领馆又邀请中苏友协机关工作人员去领馆联欢，友协副秘书长及工作人员共13人出席，会后放映了苏联电影，并加映了四部关于贯彻苏共二十二大的新闻纪录片。苏方人员在参加中方活动时，一般都避免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除了试图打探中方情况外，还展现出友好姿态。例如，苏领馆以往只设宴招待中方少数负责同志，这年则提出邀请中国各方面人士共20人参加酒会，并和中苏友协工作人员举行“见面会”。此外，苏方还要求参观工人业余文娱汇演，与中方人员举行乒乓球赛，以及向中方负责同志要求国际俱乐部经常举行舞会等。中方推测，苏方这样做是想利用庆祝活动的机会，以友好姿态拉拢中方人员，以便在各方面开展活动，扩大苏联的

---

<sup>①</sup>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二周年：请示报告、晚会情况、苏联驻华使馆晚会及双方讲话稿、与驻外使馆来往电、外省市庆祝办法及反映》（1962年1月4日—1962年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7-01003-01，第2—4页。

联系范围。在这三次活动上，苏联驻上海总领事柯立朝都做了简短讲话。在13日的庆祝会上，他除一般提及“条约的产生是两国人民斗争的收获，在加强和发展两国之间友好的、兄弟般的相互关系中起了卓越作用，并对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兄弟般的一致和自愿团结的事业有着重要意义”外，还借机宣传苏共二十二大，强调苏共二十二大决议“为实现这个条约开辟了新的光辉的前景，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加强友谊和合作创造了条件，确定了和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在14日的庆祝酒会上，他未提及苏共二十二大，只强调中苏条约的签订“不仅对苏中两国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关系，而且对世界局势都有巨大作用”。这两次讲话都提到反帝，但只字未提美帝国主义，只说“在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正在加强破坏和挑衅活动条件下，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一致和合作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中苏条约是“旨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它对保证远东和世界和平都有重大意义”，并将矛头指向日本而不是美国。在与友协联欢时，他说“这个节日是紧接着我们的春节而来的。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我们的友谊也应该在春天播种，希望秋天有一个好的收成。但仅仅播种不行，还要有艰苦的劳动”<sup>①</sup>。

13日晚，黑龙江省在哈尔滨中苏友谊宫也举行了千余人的各界庆祝晚会，副省长兼省中苏友协副会长王清正到会并讲话，会后演出了歌舞节目。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维席达柯携领馆全体人员应邀出席，并发表了近6000字的长篇讲话。14日晚，苏领馆举行电影招待会，邀请黑龙江省市党政领导人、群众团体、有关工厂企业负责人和文化艺术届代表共74人出席，黑龙江省委书记王一伦、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市长吕其恩等相关部门和团体负责同志共50人应邀参会，维席达柯和王一伦先后讲话。会上放映了中国1962年新闻简报第六号《北京声援美共反迫害斗争大会》、苏联影片《海岛家园》和纪录片《季托夫的宇宙飞行》。15日晚，苏领馆又举行了一场电影晚会，招待黑龙江外事处工作人员。在放映描写古巴革命的苏联大型纪录片《烽火岛》时，维席达柯对黑龙江外事处长荆志坚说“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个了不起的民族英雄，选他当领袖是古巴人民的眼力好，我个人非常赞同毛泽东同志关于领袖的作用这一问题的观点。”“我们骂斯大林，仅仅是因为他不尊重和热爱人民，他脱离了人民群众；而毛泽东同志正相反，他一向是尊重和热爱人民的，他没有脱离人民群众。所以，毛泽东同志称得起是伟大的领袖。”“古巴革命之所以这样彻底，是因为他们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充分发动

---

<sup>①</sup>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二周年：请示报告、晚会情况、苏联驻华使馆晚会及双方讲话稿、与驻外使馆来往电、外省市庆祝办法及反映》（1962年1月4日—1962年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7-01003-01，第87—88页。

人民群众这一论点的，对于这一论点，我举双手赞成。”<sup>①</sup>

### (三) 中共对此次纪念活动的分析及对中苏关系未来走向的判断

苏联官方对于庆祝活动的态度明显冷淡。在活动安排上，直到2月6日获悉中方打算后，苏方才勉强拿出一个历年来规模最小的活动计划，而11周年纪念时则提前一个月就通知了中国使馆。庆祝规格也大大降低，除莫斯科外，只在列宁格勒和塔什干举行了庆祝活动，且没有任何报道，原拟在2月份放映两部中国电影，最后也没有进行。只是为了对外维持团结的表象，在北京较高规模的庆祝活动陷莫斯科于被动之后，苏方才一连作了四次弥补。对应邀参加中方活动的苏方人员也严加控制，有些请帖被扣，也有不少苏联中下层干部接到请帖但未赴约，如对外经委所属各公司工作人员几乎全未到场，苏中友协则只有安德烈耶夫一人出席。有些单位由对外司长或部门负责人带队，集体活动和用餐时邀请其领导人上主席台也不去，苏外交部、外贸部和联络部的人则每次都在各个角落对每张桌子进行观察和控制。苏方中下层干部群众和业务部门态度友好，其使领馆表面态度很热情，在讲话中都强调了两国友谊和团结的重大意义，但讲话稿准备得比较仓促<sup>②</sup>。

宣传力度较往年大为减小。《真理报》对莫斯科庆祝大会和中国使馆友谊晚会的报道比较醒目，但关于莫斯科活动的版面远比北京要大，对中国五大城市及其他基层庆祝活动都没有报道，甚至对苏联驻华使馆的晚会也没有发消息。对宋庆龄与波波娃、安德烈耶夫互致贺电，只发了消息，未刊登电报全文。《莫斯科新闻》曾邀请宋庆龄和刘晓写稿，最后却只刊登了宋的题字和刘的文章，并歪曲报道了中国使馆参赞张雄飞在莫斯科大学庆祝会上的讲话。

通过对苏联庆祝活动的分析，结合此前苏联在中苏贸易谈判中故意刁难等情况，中共推断，苏方的做法是在捞取政治资本，为反华做准备，并估计1962年3月5日苏共中央全会前后，赫鲁晓夫虽然还不至于同中共公开决裂，但公开点名攻击中共是有可能的。中共认为，虽然广大苏联人民和中下层干部还是要求加强团结的，但之后一个时期中苏关系不会有根本好转，必须提高警惕，积极做好斗争准备，根据不同情况，对苏方挑衅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根据中苏两党之前的协议，对于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只有逢五逢十的周年才搞大规模庆祝<sup>③</sup>，双方这次采取偏低规格本属正常。但苏方此次无论前期计划、庆祝过程还是宣传力度，都是自1951年以来最为冷淡的；中方则以不变应万变，在各个方面尤其是苏联人民

<sup>①</sup>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二周年：请示报告、晚会情况、苏联驻华使馆晚会及双方讲话稿、与驻外使馆来往电、外省市庆祝办法及反映》（1962年1月4日—1962年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7-01003-01，第83—86页。

<sup>②</sup>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二周年：请示报告、晚会情况、苏联驻华使馆晚会及双方讲话稿、与驻外使馆来往电、外省市庆祝办法及反映》（1962年1月4日—1962年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7-01003-01，第67、84页。

<sup>③</sup> 《关于庆祝中国苏联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六周年事项》（1956年1月21日—1956年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7-00626-01（1），第55—57、73、6—7页。



中间积极争取主动权，扩大中国影响。12周年纪念活动实际已演变成为双方在政治和外交上博弈的战场，这也间接表明苏共二十二大对中苏关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 三、苏共二十二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苏共二十二大是中苏关系演变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节点。此后，中苏关系的恶化不可逆转，并逐渐演变为中苏大论战的局面。中苏同盟最终走向破裂。

#### （一）苏共二十二大是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理论化的开端

1955年5月，赫鲁晓夫放弃了原来坚持的同时解决德奥问题的立场，与奥地利签订和平条约，迈出了和平共处外交实践的第一步。此后，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或通过发言讲话，或通过实际行动，不断践行和平共处的外交理念。苏共二十二大则开了正式将这一路线纳入党的纲领的先河。根据此次大会上修改的苏共章程，党代表大会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决定党在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问题方面的路线，研究和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的极为重要的问题”。而之前沿用的苏共十九大党章只提到“决定党在当前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策略路线”<sup>①</sup>。虽然两种表述都强调党代表大会对未来拟执行的方针政策具有决定权，但苏共二十二大新党章则专门将重大政治问题具体区分为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同时特意增加了研究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的表述，表明苏共已经将苏联社会定位于共产主义建设的高级阶段。在苏共新的纲领草案中，还正式增加了关于全民党、全民国家、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等内容，从而以党纲的形式把未来政策理论化、法理化，表明苏共决定将这一方针政策贯彻于今后的内政外交工作当中。苏共的这一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当然招致了中共的强烈反对，是中苏关系走向恶化的开端。

#### （二）赫鲁晓夫对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态度

早在1955年9月，赫鲁晓夫就同当时的西德总理阿登纳说过：俄国人所面临的三个任务（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扩充军备，中国的发展问题）中，中国是最大的问题；中国的人口以每年1200万的数量递增，“这些人都靠一把米过活，这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您帮助我们对付红色中国吧”<sup>②</sup>。他始终都在警惕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变化，提防毛泽东在国际共运中争夺领导权。他认为，毛泽东最初支持反斯大林，是打温情牌麻痹苏共，以树立中共的领导权，并通过苏共把这种领导权扩展到整个国际共运。当软的一手不能奏效时，毛泽东便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试图在最短时间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英超美，顺便超苏，以显示中国建设社会

<sup>①</sup>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 《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13、163页。

<sup>②</sup> [德] 康拉德·阿登纳 《阿登纳回忆录》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5—626页。

主义的特殊方法，体现毛本人的英明领导<sup>①</sup>。

至于阿尔巴尼亚，赫鲁晓夫则始终不认为他们之间是单纯平等的兄弟关系，而更应该是长幼关系。苏共二十大后，霍查等人感觉到自己地位岌岌可危，并判断中国早晚会取苏联而代之，遂在反苏斗争中和中国“完完全全抱成了一团”<sup>②</sup>。此次中共在苏共二十二大这种最正式的场合公开支持阿党，反对苏共对阿党的攻击，反对苏共新纲领路线，挑战苏共权威，这无疑加剧了中苏两党的对立情绪，使赫鲁晓夫对中共改变路线并服从自己不再报有任何希望，也对中苏友好条约能否维系中苏同盟关系开始失去信心。

### （三）苏共二十二大是中苏大论战的前奏

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12周年活动结束后，中苏关系交恶的状况持续发酵。随着中共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中支持卡斯特罗对美国提出的五项要求，赫鲁晓夫改变了他在当年7月中印边界冲突中支持中国的立场，开始公开谴责中共和中国。从1962年11月初到1963年1月，保、匈、捷、意、德五国共产党也分别在自己的党代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共，其中以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上亲自出马、指名攻击中共为最。中共从1962年12月15日发表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人民日报》社论开始，至1963年3月8日发表《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为止，前后共发表七篇文章进行反击，中苏论战的大幕由此揭开。1963年7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面地对中共及其领导人进行指名批评。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也陆续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进行还击，中苏两党大论战进入高潮。从此，两党关系和两国同盟关系走向破裂。

（责任编辑：蒋锐）

---

① [俄]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2页。

② [俄]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0、2356—2358页。